

韓國經學教育式微原因發覆^{*}

陳亦伶

提 要

儒家經典在古代獲得普遍性的重視,是因其與教育和科舉考試息息相關。然而,若失去教育與考試的保護傘,便會漸漸失去其權威性光彩。熟知中國典籍文化史便知關於文獻的聚散與流通,先賢提出“五厄”、“續五厄”與“再續五厄”之說,以為後人鑒戒。本文順此脈絡,提出導致經書在韓國近代漢文教育史中,逐漸消解的五項重要因素。儒家經典十三經傳至朝鮮半島後,經歷史變遷因素、漢文教育政策之變化,亦有可類比“五厄”的關鍵事件,使得經書在韓國近代教育史中逐漸式微。而其經書教育之衰退,有其歷史背景與文化因素,並非全然是西學東漸所致。

如朝鮮末期地方教育經書的場所被廢除後,學子們失去求學的管道,即便由地方耆老在家教導學習,也無法有系統地學習經書,削減了經書教育的傳播力。此外儒家經典除了本身的優越性特質外,另需依靠教育與考試的外力協助,才能獲得關注。但高宗於1894年實施開化改革政策,廢除科舉取士並設立新式學校教育學子。科舉考試既已廢除,熟讀通透經書內容,無法再如以往帶來財富利祿,那麼為何還要學習經書內容?又,新式學校採用西式鐘點科目授學,亦壓縮減少漢文經學教育內容。此時地方書堂的漢文教育亦側重《擊蒙要訣》、《正蒙類語》、《幼學字聚》等基礎漢字漢文的閱讀學習,不復已往對經書典

* 此論文為2014年7月12日於韓國高麗大學舉辦之“第五屆漢字與漢文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之會議論文修改而成。承蒙匿名評審專家細心審閱,惠賜寶貴意見裨補拙文闕漏,謹申謝忱。

籍與朱子思想的深究探討,遑論進入日帝強佔期後循序漸進廢除漢字教育政策的影響。

因而,本文探討韓國史中—特別是朝鮮末期之後—幾件重要史事、漢文教育政策與經學教育式微之相互關係,提出致使經學教育式微的關鍵因素,分別為:興宣大院君廢書院政策、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式學校的設立、開化期下的拋棄儒學意識、日帝強佔期的廢漢文教育政策、廢漢字政策等,藉以知悉近現代漢文教育中經學成分式微之因。並進一步探討在此困境之下,如何尋回傳統經典的文化價值與其續存現當代之意義。

關鍵詞: 韓國漢文教育 經書教育 經學 漢文教育政策 經典式微

一、前言

帕瑪(Richard E. Palmer)(1933—2015)曾於名著《詮釋學》一書中指出“經典是道德真理的容器”,¹任何一種理論學說、新思潮、新主流皆可能隨著時代的脈動逐漸流逝,唯有經典是亘古不變的真理。而儒家經典便因具有此項特徵,而能流傳至今,並影響人們生活深遠。此外,依林慶彰先生《中國經典權威形成的幾個原因》一文來看,儒家經典能維持數千年的權威地位,便是有(1)可作為從政所需的材料,(2)可作勵志修養之用,(3)可為他人著書引證之用等其他書籍不可取代的優越性。²如《尚書·酒誥》中“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告誡人們對於大小德行要一視同仁地重視,不可只重視大的德性而因善

1 這句話在帕瑪(Richard E. Palmer)的原書裏呈現為:“The scriptural text in the Enlightenment, for instance, is the vessel of great moral truths.”嚴平將其譯為“在啓蒙時代中的《聖經》原文就是各種道德真理的容器”,《詮釋學》(臺北市:桂冠圖書,1995年4月),頁41。

2 林慶彰:《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市: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2月),頁45。

小而不爲，即便是珍惜糧食這樣的小德性亦不可輕視；又如《康誥》中訓誡政府官員不可爲了自己在民衆中的聲譽，而做出迎合百姓卻危害國家整體發展的政策。³ 在在皆可資今人借鑑，亦有其教育意義。

然而，若僅依靠經典文本本身的優越性，並不足以使其持續維持屹立不搖的地位，必須還得依靠外力的提倡，才能在內外兼具的影響下，使其源遠流長。而外力的提倡最有效且快速的方式，便是教育與考試。人們在啓蒙階段大都是被動式地學習，學校教育不教授的內容，便很難快速地被系統化學習吸收，而學校教授的科目中，若未出現在升學考試、陞進中，亦難以獲得關注。儒家經典在古代獲得普遍性地重視，便是因其與教育和科舉考試息息相關。反之，若失去教育與科舉考試的保護傘，便逐漸失去其權威性光彩。

熟知中國典籍文化史便知關於文獻的聚散與流通，隋代牛弘（543—610）曾提出“五厄”，⁴ 之後有明人胡應麟（1551—1602）之“續五厄”、⁵ 近人祝文白（1884—1968）之“再續五厄”⁶ 之說，以爲後人鑒戒，提醒人們對書籍文物的珍視與護藏。順此脈絡，筆者認爲儒家經典十三經傳至朝鮮半島後，經歷史變遷因素、漢文教育政策之變化，亦有可類比“五厄”的關鍵事件，使得經書在韓國近代教育史中逐漸式微。而其經書教育之衰退，有其自身歷史背景與文化因素，不單是西學東漸之因。有鑑於至今未有專文論及此點，甚而未明所究誤以

3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4 《隋書·牛弘傳》裏記載牛弘在開皇初年做秘書監時，曾上表請求開放獻書之路，在這其中指出古今書籍，經歷的五次大災厄，分別是：秦始皇下令焚書、西漢末年，赤眉入關、東漢末年，董卓移都、西晉末年，劉石亂華、南朝蕭梁時，侯景之亂，元帝自焚藏書。

5 胡應麟認爲牛弘所言，皆爲隋代以前史事，因此在其《少室山房筆叢》卷一裏補充牛厄之說，從隋唐到宋末，又提出“續五厄”，第一次是隋末唐初，隋煬帝楊廣在江都被殺，時局動蕩，圖書被焚。第二次是安史之亂，安祿山入關後，唐玄宗李隆基出奔蜀，書籍因而損失殆盡。第三次爲黃巢起義，黃巢入主長安，唐僖宗李儂出走，書籍亦被焚毀。第四次則爲靖康之難，金兵攻破汴京，擄走宋徽宗與宋欽宗等數千人，也連帶擄走皇家藏書等奇珍藝品。最後一次爲南宋德祐二年，伯顏攻取臨安，圖書禮器皆被運走。

6 繼胡應麟之後，近人祝文白先生又於《兩千年來中國圖書之厄運》一文中，將元代至今七百年間的圖書聚散又總結爲“再續五厄”，分別爲李自成攻陷北京、錢謙益絳雲樓之烈焰、清高宗焚書（纂修《四庫全書》）、咸豐朝的內憂外患、民國時期中日戰役等。

西學所致定論者，為正本清源，筆者於本文探討韓國史中——特別是朝鮮末期之後——幾件重要史事、漢文教育政策與經學式微之相互關係，進行梳理，藉以知悉近現代韓國教育中經學式微之因。並進一步探討在此困境之下，如何尋回傳統經典的文化價值與其續存現當代之意義。

二、韓國古代漢文經書教育面貌簡述

吾人雖無法得知漢字傳入朝鮮半島的確切時間，但從史籍可知經學早在百濟時便已傳入朝鮮半島，⁷而由於儒家經典的權威性，當時的漢文教育主要内容便是經書教育，最早的紀錄為高句麗的小獸林王二年(372)時，“立太學、教子弟”，⁸在新羅時更明確地指出，教育機構所採用的學習教科書便是傳統中國經學——四書五經——中的《尚書》。⁹接著還設立了“四書五經齋”，¹⁰之後到了高麗開國初期，高麗成宗(961—997)曾向宋太宗(939—997)請求書籍輸入，《宋史·高麗列傳》中便記載了當時賜與的書籍為“九經”、《唐史》與《冊府元龜》。¹¹大抵而言，韓國古代漢文教育的經書教育，依朝代時期分別有下列特徵：三國時期受漢朝影響“五經”並重；統一新羅時期因佛教興盛，較重視講求孝道之《孝經》與《論語》；高麗後期安珣(1243—1306)將朱子學引

7 後晉劉昫：《舊唐書·東夷列傳》：“百濟國，本亦扶餘之別種，嘗為馬韓故地……其書籍有‘五經’、子、史，又表疏並依中華之法。”（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328—5329。

8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18《高句麗本紀》“小獸林王二年”條（漢城：財團法民族文化推進會，1973年），頁140。

9 金富軾：《三國史記》卷9《新羅本紀第九》“惠恭王元年”條：“元年，大赦。幸太學，命博士講尚書義”。

10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74《選舉二》“學校”條：“（恭愍王）十六年，成均祭酒林樸上言，請改造成均館，命重營國學于崇文館舊址，令中外儒官，隨品出布，以助其費，增置生員，常養一百，始分五經四書齋。”（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72年），頁628—629。這五經四書齋便是：論語齋、孟子齋、大學齋、中庸齋、詩經齋、書經齋、周易齋、禮記齋、春秋齋。

11 元脫脫：《宋史》卷484《高麗列傳》：“表求太宗御制詩章隸書石本，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宋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所獻馬。”（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14042。

入高麗王朝後，¹²性理學影響古代韓國甚鉅，到了朝鮮時代更可說是朱子學的時代，至此“四書”凌駕於“五經”之上，發展出有別於中國經學之韓國經學。

除了學校教授經學，在任用官員、陞進取士上，古代朝鮮半島自高麗時代便開始沿用唐代制度，設立科舉考試制度，考科亦隨唐制。¹³自唐朝引進的科舉制度與新羅時的“骨品制”¹⁴相較，更能公平地拔擢人才。因此自高麗光宗九年(958)開始實施科舉取士，至朝鮮高宗二十年(1894)廢止為止，於朝鮮半島共實施了936年，是中國以外實施科舉制度時間最長的國家。從出題的變遷可瞭解經學各科目的消長，例如世宗朝初始“四書五經”皆納入試題，但由於經書內容太難，開始出現可選擇性地僅考“四書四經”或“四書三經”的內容。會有如此變革的主因是為減輕儒生負擔，並鼓勵精讀經書內容，求專經而不求龐雜。但由於《周易》內容理解較困難，亦不易背誦，因此從成宗朝開始，《周易》考科分數可加倍計分，¹⁵到了孝宗六年(1655)時，若選考《春秋》亦可加分，¹⁶也間接影響士人著書意願偏重某經及書肆的出版流通。

此為韓國古代漢文經書教育面貌之簡述。朝鮮王朝過於尊崇朱子學說，致使傳統十三經傳到朝鮮半島後，由“四書五經”改為“四書三經”，使得韓國經學著述多集中於“四書”上，亦可說是對經學研究多樣性的縮減之礙，¹⁷但至少經學教育與研究是持續進行的。然而，進入近現代後，由於種種歷史因素與教

12 鄭麟趾：《高麗史》卷105，《列傳十八·諸臣安珣》：“安珣，初名裕，興州人，官至密直副使致仕。……付博士金文鼎等，送中原，畫先聖及七十子像，并求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晚年，常掛晦庵先生真，以致景慕，遂號晦軒，蓄儒琴一張。”（頁322—324）。高麗史的這段紀錄顯示了安珣推動教育請人至中國訪求經史書籍，從其晚年掛置朱熹肖像來看，至少在此時朱子學說已傳入韓國。

13 《高麗史·選舉志》序文：“三國以前未有科舉之法，高麗太祖首建學校，而科舉取士，未遑焉。光宗用雙冀言，以科舉選士，自此文風始興，大抵其法頗用唐制。”

14 骨品制是一種依血緣關係訂定階級，按血統確定身份等級及相應官階，因而影響出仕，新羅統一三國後繼續沿用，但是若能博通“五經”、史書則能超越骨品限制，獲得拔擢出仕。

15 《中宗實錄》卷2，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今別試，於三經，抽一經試之，而《周易》獨倍畫，甚為不均。請罷倍畫之法。傳曰：《周易》倍畫之法，成宗豈不詳度，而為之乎？仍舊可也。”

16 〔朝鮮〕徐宗玉等：《續大典·禮典》諸科：“式年文科覆試，初場‘四書三經’背誦，願講《春秋》者、聽《周易》《春秋》倍畫。”（首爾：首爾大學奎章閣，1998年），頁202—203。

17 更進一步內容可參考拙作：《從“四書五經”到“四書三經”——對韓國經學研究的影響與展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4卷第1期，2014年3月，頁55—72。

育政策,使得經學在近代教育體制中逐漸消失崩解。經書在韓國近代史中,逐漸式微,可類比“五厄”之五個重要關鍵事件,析探如下。

三、韓國經學教育式微五因

(一) 興宣大院君廢書院政策

衆所週知,書院是古代教育制度中有別於官學,設置於各地方的另一種教育機構。同樣地,在古代朝鮮半島也有書院的設置,只是在高麗末期名爲書齋而非書院。當時儒者與中小地主撥出持有的土地與財產,設置名爲書齋的私學來教育學子,並一直沿用到朝鮮時代,由地方未能出仕之士人們繼承,並效仿朱熹的“白鹿洞書規”改書齋爲書院。由是,朝鮮半島第一座書院便名爲“白雲洞書院”,由周世鵬(1495—1554)於中宗三十八年(1543)所創立。當時的書院除了講學教育功能之外,祭祀先賢的活動更是一種精神權力的象徵。之後李滉(1501—1570)赴任豐基郡守後,接手管理“白雲洞書院”,並向朝廷建議君王應該賜與書院匾額,以示國家認可其涵養孕育地方人才之功。因此,明宗李峘(1534—1567)御筆賜予“紹修書院”匾額,白雲洞書院自此改名爲紹修書院,蘊含頹廢不振的儒家精神再次獲得傳承之意。因此,獲得君王賜予御筆匾額的書院又稱爲“賜額書院”,此外並能獲得國家贈予之書籍、土地與奴婢。種種優惠措施誘使書院紛紛設立,甚至使其地位逐漸超越國家建立之鄉校,也壯大士林的聲勢,從而結黨分派,至宣祖朝¹⁸地方書院更已超過百所,足見其勢力之龐大。

然而樹大必有枯枝,龐大的地方書院勢力,逐漸開始腐敗。高宗朝¹⁹初期實質掌權的興宣大院君(1820—1898),爲了強化王權並削除貴族與地方士林力量,於高宗元年(1864)下令禁止書院的重設或私設,當時多達六百七十多所

18 宣祖李昖,朝鮮王朝第十四代君王,在位期間爲 1568—1608 年。

19 高宗李熙,朝鮮王朝第二十六代君王,在位期間 1863—1896 年,1897—1907 年在位時爲日帝強占期前的大韓帝國時期。

書院經過興宣大院君的打壓整頓後，所剩無幾，至高宗八年（1871）僅剩四十七所書院。地方教育經書的場所被廢除後，學子們失去求學的管道，即便由地方耆老在家教導學習，也無法像以前那般有系統地學習經書，大大削減了經書教育的傳播力，此為經書教育在韓國近代史中逐漸式微的因素之其一。

（二）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式學校的設立

朝鮮王朝末期列強不斷侵擾，要求開放港口貿易，國際情勢的轉變讓長久以來遵奉儒家思想的朝鮮社會，出現必須拋棄舊有儒家思想，並接受開放西化才能挽救國家命運的聲音。因此高宗不得不採取開化的態度與方向來面對國際情勢，並於 1894 年的甲午改革（或稱“甲午更張”）進行近代化改革，其主要內容之一便是廢除科舉制度。如前文所述，儒家經典除了本身的優越性特質外，另需依靠著教育與考試的外力協助，才能獨占鰲頭、引領古代學術數千年。科舉考試既已廢除，熟讀通透經書內容，無法再如以往般帶來財富利祿，那麼為何還要教育、學習經書內容？更遑論在高宗廢除科舉之前，大院君早已消除地方經書教育的機構——書院。再加上廢除科舉考試之舉，無疑是對經書教育的雪上加霜。在 1895 年高宗頒布的“教育詔書”²⁰中，又更進一步指出：

祖先의 丕基를 守호야 萬億年の 休命을 延續호노니 嗚呼라 民을 敎치 아니면 國家를 鞏固케 하기 甚難호니 宇內의 形勢를 環顧호건디 克富호며 克強호야 獨立雄視호는 諸國은 皆其人民의 知識이 開明호고 知識의 開明은 敎育의 善美호므로 以흠인 則敎育이 實로 國家保存호는 根本이라 是以로 朕이 君師의 位에 在호야 敎育호는 責을 自擔호노니 敎育도 또한 其道가 有한지라 虛名과 實用의 分別을 先立호미 可호니 書를 讀호고 字를 習호야 古人의 糟粕만 掇拾호고 時勢의 大局에 矇昧한 者는 文章이 古今을 凌駕호야도 一無用한 書生이라……朕이 政府를 命호야 學校를 廣設호고 人才를 養成호은 爾臣民의 學識으로 國家의 中興大功을 贊成호기 為호미라.

²⁰ 1895 年 2 月 2 日官報。

這份詔書的中譯文內容主要是“祖先傳承下來的學問固然可貴，然而面對列強侵擾等種種因素，經書教育已對現實無所幫助，僅學習背誦古人的糟粕是沒用的，需採用‘知識之開明與教育’，廣設學校，養成人才，才能中興國家、救國圖存”。而這裏所說的“廣設學校”，指的便是西式教育學校的導入，改變傳統教育方式，以西式鐘點時數分科教育的西式學制。

前文提及高宗於 1894 年 6 月廢除科舉制度外，並於同年 7 月 20 日將自高麗朝便開始沿用的中國官制禮曹廢除，改設“學務衙門”。之後學務衙門根據“小學校令”²¹設立了當時第一所西式學制小學。從官報可得知當時開設的科目有：修身、讀書、作文、習字、算數、體操、本國地理、本國歷史、外國地理、外國歷史、圖畫等。而這裏面的“讀書”、“作文”科目雖有教授漢文內容，但經學教育分量與改革之前相較有如天壤之別。此外從《增補文獻備考》亦可得知，面對列強的侵擾，比起學習漢文，當時認為培養各國外語的翻譯人才更為急迫。²² 加上高宗的政策，不僅官辦學校減少漢文經學教育內容，此時地方書堂的漢文教育亦側重《擊蒙要訣》、《正蒙類語》、《幼學字聚》等基礎漢字漢文的閱讀學習，不復以往對經書典籍與朱子思想的深究探討，此為其二。

(三) 開化期下的拋棄儒學意識

韓國史上的開化期一般指的是 1876 年與日本簽訂不平等《朝日修好條規》(或稱《江華島條約》)後，至 1910 年日本始佔領朝鮮半島前，這三十五年間。這段期間不只朝鮮半島，中國同樣遭受列強的侵擾。雖厭惡憤恨日本之侵略，卻也使朝鮮社會開始出現反省檢討的聲音。為何同樣位處東亞的鄰近三國，日本強大至足以侵略他國，而過去一直遵奉並定期朝貢的中國，卻開始無法保護韓國且一同遭受他國欺侮？部分有識之士認為是守舊的儒學思想造成這種差異，需得向日本學習開化、接受西方文化，才能強

²¹ 官報第 119 號，敕令第 145 號。

²² 《增補文獻備考》卷 209：“內務府啓，現今各國交際語學最急，另設公院，擇年少聰敏者，請令肄習，故有是命。”(頁 429)。

化國力。

延世大學歷史系教授白永瑞先生曾在《韓國人的中國認識之軌迹》一文中，對開化期當時的報紙進行分析，得出當時韓國輿論對中國的認識，並歸納為三類：“賤之清”、“作為東洋和平一員的中國”、“作為改革典範的中國”。²³ 而白永瑞先生所指的“賤之清”，代表當時韓人對中國的印象，而這也正是開化期下拋棄儒學意識的因素之一。古代韓國遵奉事大慕華主義，派遣唐使與留學生，無不是因其崇敬喜愛中華文明而實行的文化政策。然而從使節團的文獻史料中，由明代的《朝天錄》到清代的《燕行錄》名稱演變，便可知悉個中差異。原本就不喜相較於正統“漢明”的“滿清”，再加上晚清末年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後，朝政日益腐敗，以致無法抵抗列強，因而產生對清蔑視，連帶一併排斥漢文（此時說的漢文泛指用漢字書寫的記載儒家思想書籍）。白永瑞先生羅列開化期創刊的《獨立新聞》、《皇城新聞》、《大韓每日申報》²⁴內容為證，說明此時的對清認識。筆者於此轉引《獨立新聞》中的兩則報導如下：

한문책이란거슨 대개 청국에서 만든 책인데 여러 백년 된거시 만히 잇슨즉
가량 그 책들이 그 만들 때는 청국 백성의게 유조하엿스려니와 오늘날
조선 인민의게안 그 학문이 유할거시 업슬뿐 아니라 청국 인민의게도 해가
대단히 잇는거슨 오늘날 청국을 보면 가히 알 일이다. (1896年4月25日)

這則新聞的中譯內容為：“所謂的漢文書籍，即中國所刊刻之書籍，這些已經經過數百年的舊書，即便對當時的清朝人民有益，但顯然是無益於朝鮮民衆的，且也同樣無益於現在的清朝人民，看看今天清朝的現況即可不言而喻。”又，

23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市：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出版，2009年9月），頁141—202。

24 《獨立新聞》1896年創刊、《皇城新聞》1899年創刊、《大韓每日申報》1904年創刊。

사서삼경으로 대표되는 중국의 전통학문을 이제는 정치 학문과 부국술법을 하나도 업고 헛되히 청춘적 세월을……(1898年9月19日)

中譯內容爲：“‘四書三經’所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如今已變成對政治學問與富國之術全無幫助，僅是白白耗費青春歲月的舊學。”

如此嚴厲地批評主要是朝鮮社會當時分爲改革派與保守派，亟欲開化改革救國的一派，希冀藉此打醒守舊的保守派。而即便同屬開化陣營者，亦分爲較親日的一派與主張自主獨立的一派。主張自主獨立的一派希望朝鮮半島自此不受清朝或日本牽制，因此嚴厲批評清朝舊學。其實，稍晚於此，不僅當時韓國社會開始出現拋棄儒學意識，中國亦是如此，最爲人熟知的便是蔡元培(1868—1940)於1912年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時，下令廢止讀經，認爲祭孔是宗教迷信行爲而廢除學校中的祭孔運動等。反觀當時的朝鮮半島，即便信仰西方宗教者(天主教等)，過節時亦會祭祀祖先先賢，筆者認爲當時的改革派所要拋棄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具有清代色彩的科舉考試中之主體，即“窠臼的經書”，而非代表道統的儒家精神。因此，開化期下的拋棄儒學意識，爲經學教育式微原因之三。

(四) 日帝強佔期的廢漢文教育政策

時序進入日帝強佔期後，如同歐洲各國在殖民地所作的文化侵略般，日本於1895年殖民臺灣、1910年強佔韓國後，爲使文化侵略順利進行，皆實行過廢除漢文教育使殖民地人民學習日語政策。然而，雖都是廢除漢文教育，但在臺灣與韓國的實施上有所差異。日本在臺灣是爲了去中國化而實行的政策，而在韓國則是去除朝鮮色彩而實施的政策。

由於古代韓國統治者及士大夫曾一度尊崇中原文化、使用漢字，因此韓語中漢字詞彙相當多，因此一開始日本強佔之後，無法斷然去除漢字教育。從1906—1909年間的官報與1910—1937年間的朝鮮總督府官報來看，不難發現在語言課程開設上的變革。開化期初始設立學校時，開設的語言科目如“國語”、“漢文”、“外國語(或日語)”，到了1909年9月第二次學校令頒布後，改爲

“朝鮮語與漢文”、“國語(即日本語)”,把漢文教育併入朝鮮語內。進入日帝強佔期後,日本爲了強化文化侵略的速度,於1937年把“朝鮮語漢字”課程改爲“日本語漢字”課程。²⁵當時認爲同樣是學習簡易的漢字,在“朝鮮語漢字”也學,“日本語漢字”又學,太浪費時間。爲精簡有效地學習,而把“朝鮮語漢字”中的漢字課程取消。表面上看來是爲了減輕學生負擔,更有效率地學習漢字,但實則是悄悄地去韓語的文化特色。因爲即便韓語與日語皆使用漢字,同屬漢字文化圈,但日語的漢字詞彙與韓語的漢字詞彙不同,是“和製漢字”詞彙。例如表示管制意思的 취체(取締)是和製漢詞,原本韓文表現方式爲 단속(團束);又如代表接收、收納의 수부(受付)也是和製漢詞,韓文表現方式爲 접수(接受)等。

如同殖民臺灣時,日本廢除漢字的政策,一方面是不希望韓國繼續受中國影響,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去除朝鮮語言文化。而這原本僅是希望殖民地人民學習日語而廢除漢文教育,也或多或少間接地影響了經學教育的傳播。因廢除漢文課程後,在僅能教授日語漢字課程裏,漢文經學的授課內容更加精簡。當時的課本雖持續以經書內容爲漢文教材,但主因並非延續經書教育,而是因爲漢詩字句雖美,但有平仄格律的限制,雖可朗朗上口卻不易教導學子了解其意;而散文作品篇幅過長,常得刪減,因而以格言式的經書文句爲佳,其中又以口語問答式的《論語》、《孟子》尤勝。如1911年的《普通學校學徒用漢文讀本》第一課內容如下: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²⁵ 朝鮮總督府令第131號,朝鮮總督府官報第3188號。

這裏摘選了《論語·季氏篇》與《孟子·萬章下》的內容。而此時的高年級漢文教材,多選《論語抄》。因而,綜上所述可知,“十三經”傳到朝鮮半島後,先縮小為“四書三經”,再集中於“四書”,到了日帝強佔時期更僅剩《論》《孟》的斷簡殘篇。也就是說,在朝鮮半島對讀書人的漢文教育中,經書教育的部分是逐漸限縮範圍,從整部專經的研讀縮小到孔孟的格言佳句,片段單句式地學習,而不復以往整篇、全書式的學習。

(五) 廢漢字政策

韓國的廢漢字政策是循序漸進慢慢地進行的,雖然後來沒有絕對成功,卻也對經書教育帶來不小的殺傷力。高宗在 1895 年頒布的“國漢混用令”,將一直以來以漢字文為主的官方文書,改為韓文與漢字合用的法令。到了 1948 年韓國自日本殖民光復後,民族愛國意識高漲,同年 10 月 9 日更頒布公用文書一律改為全韓文方式書寫,之後朴正熙上臺於 1970 年禁止小學教授漢字政策。但由於韓文為表音文字,雖方便學習但卻存在著大量同音異義詞彙混淆問題。例如“부자”有父子與富者兩義、“전기”有前期與電器兩個意思,若不根據前後文無法確知所指為何;醫生與義士的韓文皆為“의사”,單從前面的人名無法確知是某某醫生,或某某義士,需得根據前後文才能了解該處為某某醫生或某某義士。又如人名姓氏中的林與任皆為 임、鄭與丁皆為 정,若不標示漢字無法確定其姓氏。因生活中缺少漢字有種種不便,因此韓國教育部研擬於 2018 年重新恢復小學教科書中韓文與漢字併記政策,然而韓文學會、國語文化運動實踐協議會(국어문화운동실천협의회)等團體持續示威抗議中。²⁶ 而這些保守團體的抗議除了出於民族心的反對,也有些父母親擔心增加學子學習負擔,而持反對意見,當然其中也有認為學習英文等西方語言比漢字更有用而持反對意見者。然而現代韓語加入大量西方外來語,例如描述顏色時,不說固有漢字韓文的 분홍색(粉紅色),而說 핑크색(pink 色);業務事項確認時,比起使用

26 參“[동아쟁론] 초등교과서 漢字 병기 부활 (東亞爭論-小學教科書漢字併記復活)”東亞日報 2015 年 6 月 19 日 A28 面與東亞日報電子版 <http://news.donga.com/3/all/20150619/71952331/1>。

漢字韓文的 확인 (確認) 更喜歡使用 체크 (check), 覺得更加時髦。如此看來, 去除漢字造成的混淆, 改由外來語來填補, 對自我民族文化的凝聚與認同亦無助。

因此, 如果連識字都成問題又如何能習讀經書內容? 由於 1970 年的政策之因, 國、高中才開始學漢字, 義務教育階段的漢文教育以識字為主, 進入高等教育後才開始接觸經書內容, 也導致了經學研究的起步較晚。韓國最早有關經學的學位論文是出現在 1952 年首爾大學中文學科碩士張深鉉的《詩經章句法研究》, 韓國學術界最早舉辦的經學研討會則是遲至 1995 年 10 月 13、14 日, 於成均館大學大東文化研究院舉辦的“韓中日三國經學(17—19 世紀)發展的意義與性格”學術研討會, 由此二例來看, 不難發現經書逐漸式微之軌迹。

四、結 語

韓國的經學教育式微有其歷史文化原因, 過去人們慣以西學東漸來解釋一切, 實則有其深層原由與複雜因素。筆者順著圖書聚散的“五厄”之說, 提出影響經學教育式微的五項重要因素: 興宣大院君廢書院政策、科舉制度的廢除與新式學校的設立、開化期下的拋棄儒學意識、日帝強佔期的廢漢文教育政策、廢漢字政策, 藉以知悉韓國近現代教育中經學成分式微之因, 不單是西學之故。

縱使有相對較開放派的韓國學者認為經學式微應為“幸”事, 而非“厄”事。但韓國自古遵奉事大主義, 認為唯有強大的國家才是值得學習, 且能對其起保護作用。朝鮮時代對明清進貢, 朝鮮末期見清朝不敵列強節節落敗, 進而逐漸對儒學失去信心, 轉而學習西方。因此, 筆者認為韓國的經學教育式微並不僅是單純的西學問題。經學有其經典的存在價值, 同樣接受經學浸潤的日本, 出現渋沢栄一《論語と算盤》(論語與算盤) 這樣將儒家經典應用於企業經營管理的名著, 便可見經學並非窠臼。

近來韓國經濟復甦, 開始發展人文事業。起因於十九世紀末列強侵侮與日帝強佔殖民, 為使喪失國權而萎靡的民族自信心獲得提振, 於是發展人文事

業以喚醒人民對自我文化的重視、恢復傳統民族自信心。於是對大眾廣設人文都市事業、各類人文講座；於學術機構進行各種儒教經典講讀會、文化 contents 活動；對研究機構廣泛支持各種點校定本工作、進行史料文獻整理、《朝鮮王朝實錄》的英譯計劃等。但韓國史料文獻《高麗史》、《朝鮮王朝實錄》、韓國漢文小說、韓國古代詩歌等不斷引用經書字句，若完全摒棄經學便使韓國歷史文化不可避免地出現殘缺。欲推廣振興文化，無法完全不談經學。而在再度振興文化事業、推動經學教育前，應該先究明經學教育式微之真正原因，了解經學與韓國文化的關聯性，推動遭遇質疑與阻礙時，才不致輕易被抨擊為守舊、保守等。

經學思想內容與韓國文化、日常生活息息相關。例如韓國飲食習慣中以筷子夾菜、湯匙吃飯，同時不拿取兩種食器之習，來自《禮記》中所記載的中國古代飲食習慣，²⁷宋代朱熹亦曾言：“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²⁸又如韓國婚禮中新人母親上前點燃蠟燭之儀式，吾人觀看連續劇中常出現此橋段，以為是韓國特有的儀式，實則源自《禮記》。再如韓國新聞中說的“발인(發靚)”就是中文裏的“出殯”，亦出自《禮記·檀弓篇》。可見經學早已融入朝鮮乃至現今韓國當地的社會文化，無法完全切割棄除。現在社會中雖不似古人需得熟讀背誦經書，以藉由科舉考試獲得名利，但經書教育仍有其存在意義，除了涵養性情外，還可以幫助人們了解生活中文化智慧典故，更進一步由經書研究探求古代史事、政策實行之因，藉以鑑往知來，達到經世致用之效。

(作者：香港浸會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²⁷ 《禮記·曲禮》：“飯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鄭玄注其為：“貴者，匕之便也。”又“挾，猶箸也，今人謂箸為挾提。”便說明了古時候人們吃飯的時候不用筷子，一般平民用手指捏飯，富者家中有匕（長柄淺勺之食器）則以之代手，而夾菜的時候才用挾（筷子）夾菜。

²⁸ 《童蒙須知·雜細事宜第五》：“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箸於案。”

引用書目

一、專書

白永瑞：《思想東亞：韓半島視角的歷史與實踐》。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2009 年。

林慶彰：《中國經學研究的新視野》。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帕瑪著，嚴平譯：《詮釋學》。臺北：桂冠圖書，1995 年。

金富軾：《三國史記》。漢城：財團法人民族文化推進會，1973 年。

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

徐宗玉等：《續大典》。漢城：首爾大學奎章閣，1998 年。

脫脫等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

朝鮮總督府官報。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85 年影印。

鄭麟趾：《高麗史》。漢城：亞細亞文化社，1972 年。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二、電子資料庫

承政院日記 <http://sjw.history.go.kr/main/main.jsp>

朝鮮王朝實錄 <http://sillok.history.go.kr/main/main.jsp>

韓國古典綜合 DB <http://db.itkc.or.kr/itkcd/mainIndexIframe.jsp>

The Analysis of the Decline of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in Korea

Chen I-Li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Centre for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the historical records, we understan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as been brought into the Korea far before the era of Baekje (百濟). Du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becomes the major of Chinese education at the time. Since the education was inseparably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as respected by general in ancient times. However, the authoritative gl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had gone out after losing the connection in the examination.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Classics culture history, we understand that it's well-known for the accumu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Sages stated the theory of "Five Destruction trilogy" to warn the future generation, the from time immemorial.

Through the policy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transition from time to time, it had occurred the "Five Destruction" which caused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o be neglected gradually in the modern Korean history of Chinese education after the representative thirteen Confucian Classics propagated in Korea. After the place where the Confucian Classics was taught had been abolished, the students lost the learning channel. Even though they had been taught by the elder at home, the students still couldn't learn about the Confucian Classics precisely; likewise it had weaken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education. In addition to the ascend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t needs the

external assistance like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to get the attention. From the 1894, Joseon Gojong executed the civilized revolution policy —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school to teach the students. Since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ad been abolished, no matter how thoroughly you study in Confucian Classics, it wouldn't be able to bring the fame and wealth. Then, what's the point to study in Confucian Classics? Moreover, new schools adapted the western pedagogy of credit hour curriculum caused the lesson of Chinese Confucian Classics had been compressed. In these time, local home school emphasizes on the basic Chinese reading as “jimengyaojue (擊蒙要訣)”, “Joengmongyueo (正蒙類語)”, “youxueziyu (幼學字聚)” ... etc but the commentaries of Chinese Classics and the thoughts of Zhu Xi, not to mention under the Japan dominion, Chinese education had been abolished gradually.

Therefore, in this article, we are discus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a few important histories,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Classic deconstruction in the Korean history, especially after the end of ZHAO XIAN dynasty. It states the “Five Destruction”, which leads to the Classic deconstruction, are Heungseon Daewongun abolished colleg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schools, the thought of de-Confucianism under the civilization, the abolish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under the Japan dominion, and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of the Classic destruction in the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Keywords: Korea Classical Chinese education, Education on the Confucian Classics, the Confucian Classics, Classical Chinese Education Policy, Classic Decline